

对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调研和思考

胡显章

摘要: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培养人的根本任务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向深入。近几年来,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所开展的工作促使我们反思,需要我们提升理论思维意识与能力,下大力气确立理性的教育理念。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调研;理性思考

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到现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如张岂之先生所说,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作为这个历程的参与者,笔者感到欣慰。同时,与许多这一历程的参与者一样,笔者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无论在认识上或实践上,都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仍然任重道远。

一、清醒认识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根本任务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第一,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所指出的:“高等教育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实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说明这种挑战是世界性的,我国概莫能外。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艰巨的提高国民首先是高校师生人文素质的任务。第二,信息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剧烈的竞争,要求高等教育站在科学技术的最前沿。我国为了实现向创新型国家转型,对人才的科学素养特别是创新素质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正如清华大学这样的一批国家寄予厚望的大学,受到了加速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巨大压力。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和中国的崛起,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在植根自身民族文化沃土的同时,具有跨文化的胸襟和能力。总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即将成为生力军的当代大学生在文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2005年杨振宁先生在首届中国文化论坛的讲话中指出:“目前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可是我在清华待了一年半以后,感觉到很多大学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不够认识”,杨先生呼吁:“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今天的大学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灌注到每一个大学生身

上”^[1]。实际上,这首先是对高等教育工作者提升自身文化自觉的呼吁。文化自觉是指重视文化的作用,对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有清醒的认识,能够进行主动的文化选择、发展和传播,主动肩负起文化建设的任务。大学教育应当自觉肩负起以先进文化孕育人才、引领社会的任务,而前提是正确认识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2]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正是以文化育人的自觉为前提,以文化育人任务为根本的。当今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缺乏这种自觉有关。现在的教育教学包括许多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或通识教育课程,往往还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离文化育人的功能仍有较大距离。我们面临着普遍提高文化育人的自觉性和实效性的任务,其中推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仍然是关键性的任务。

二、调查研究的情况和当前的工作

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承担了清华大学校级课题“通识教育发展道路和清华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途径研究”和北京市课题“建设创新型国家背景下的文化素质教育研究”,课题组成员对国内外以及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研。在国外到美国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帕森设计学院等美国顶尖大学以及韩国首尔大学、延世大学,了解通识教育的最新动态和进展;在国内对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全国15所重点大学进行了学习考察;在清华大学校内与19个院系的

领导、教师代表进行了访谈、交流,就为什么要开展和怎样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形成较多的共识,取得了院系的支持;继而在校内11个院系的学生以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调研,掌握了许多一手资料,尤其是听取同学们关于文化素质教育课的数量和质量、选课的方式、授课时间以及考核办法等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与学校主要领导多次就文化素质教育进行汇报、研讨,以形成共识和争取支持。

(一)国外调研概况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已经进行了近两个世纪,但仍缺乏公认规范的表述和共识,美国高等院校协会在2005年开始推动一场为期十年的“何谓通识教育”的大讨论和“弘扬通识教育价值”的运动;哈佛大学在19世纪以来先后进行过4次有关通识教育的改革,近几年又对通识教育进行新的反思与调整。我国大学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时间要短得多,虽然取得重大突破,但只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真正使文化素质教育成为广大干部师生的一项自觉行动,并且走上一条科学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还要下很大功夫。这是一个基本估计,由此,既不为其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又不为其遇到的困难而沮丧。同时,我们应当从国外的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中汲取营养。

(二)国内兄弟院校通识教育的情况与基本经验

国内兄弟院校通识教育开展得好的院校有如下共性:

1. 领导重视,理念先行。主要领导十分重视文化素质教育,把这项工作作为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来坚持。如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由校党委书记或校长担任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或领导小组组长。所有学校都有1名副校长或副书记具体负责这项工作。都把转变教育观念作为最重要的环节来抓。普遍组织了教育思想的讨论,努力提高干部和教师的思想认识。如复旦大学在2007年就组织了400多场次的研讨会。东南大学1997年就组织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并制定了《东南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

2. 重视领导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探索。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各校都设立了由校领导担任主要负责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进行全局部署、协调各方,自上而下地进行这项工作。华中科技大学提出这是一项“校长工作”,而不仅仅是某个部门和院系的工作,要列入学校的经常议事日程并有专门的校级负责人具体领导和落实这项工作。复旦大学由校党委书记推动、教学副校长负责,在发动全校师生

进行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基础上单独成立了一年级本科生学院——复旦学院。其他如浙江大学的求是学院、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等,这种体制和机制的优点是,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教学工作落实情况较好,同时形成了人文小环境。但由于体制变动大,面临与相关院系和部门的一系列矛盾,解决起来有较大难度。

从各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具体运行机制来看,各有特色。凡是基地设在教务处或由教务处主要负责人抓运行的基地,往往工作容易落实、协调能力也强一些。有的学校总结说:“教务处管、抓课程”,“学生处管、抓活动。”课程教学毕竟是主渠道,所以由教务处抓就抓住了最重要的环节。

3. 各校对课程教学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有共识。大多数学校专设文化素质教育课程10年以上,目前正朝核心化、精致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研究型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所占学分一般在12~15学分左右,已经建设了一批国家级精品课。

在实施课程教学过程中,有的学校进行了严格的教学管理。如浙江大学,对开设什么课程由课程专家组投票决定,鼓励高水平的教师开课,每年由专家对课程进行评估,决定哪些课程继续开,哪些课程要停开,哪些课程要增开。湖南大学采取文化素质课程“准入制”,教学指导委员会每个学期都要对下个学期要开的课程进行审定、决定取舍。

加强课程建设,最重要的是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热心文化素质教育的师资队伍。各校都给予了相当重视,但由于条件等方面限制,发展并不平衡。

4.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专业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是各校重点探索的问题。杨叔子院士说:“有了知识,不等于有人文精神,过去我们的教育是以专业为核心,现在是以素质为核心。在教育理念上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一定要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南开大学顾沛教授说:“文化素质教育不仅是人文教育,而是全面的科学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同时,他带领团队开设《数学文化》课,使学生从哲学的高度反观数学的发展、感悟数学思想、开阔视野,收到很好的效果并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天津大学《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效果也很好,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各校都认为,开设体现人文与科学融合的课程很不容易,主要是对开课教师要求高,难点在多数理工科的教授“不理解、不想讲、不会讲”。但无论如何,这个方向要坚持下去。

另外,一些高校如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组织讲座的经验也十分宝贵。

(三)清华大学学生调研情况

1.对文化素质教育的评价。大多数同学表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覆盖面较广,选择余地大,课程内容新颖,能够引人入胜。有超过60%的学生认为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设置是成功和较成功的,认为差的只有1.4%,但是认为很成功的比例也不高,只有近7%。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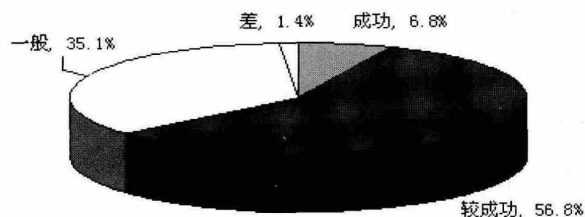


图1 清华大学本科生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内容设置的评价

对于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教师的总体印象,大多数同学认为授课老师有思想、知识内容丰富、风格轻松、论点新颖,22.4%的同学表示很满意,61.8%表示较满意,认为“一般”的为15.8%,没有同学认为“差”。

2.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效果。调查中,同学们普遍反映,通过选修文化素质课程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有85.5%的同学认为“扩大了知识面,开拓了视野”;56.6%的同学认为“提高了综合素质”;31.6%的同学认为“学会了其他学科的思维方法”,具体如图2所示。还有的同学表示,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培养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拓展了视野,提高了思维广度,增强了文字功底;有利于修身养性,提高了对社会的认知程度;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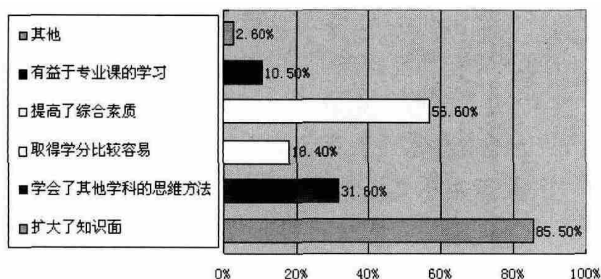


图2 清华大学本科生学习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收获情况

关于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课组,同学们认为受益最大的分别是“历史与文化”(57.1%),“艺术与审美”(49.4%),“哲学与人生”(48.1%),当代中国与世界(41.6%);其他依次为语言与文学(23.4%),科技与社会(9.1%),基础社会科学(7.8%),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1.3%)。

3.存在的问题:同学们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归纳如下:①相当一部分课程的设置比较“水”,反映在内容与要求两个方面;②学习负担过重,常使学生们在

学习各门课程时蜻蜓点水、学而不化,学生在课余,往往“不读书”“不思考”,难以真正巩固和消化课堂之所学和所想,更难自觉拓展;③核心课程供不应求。

学生建议:①改进课程设置,扩大课程数量和容量;②加强选课指导和课程教师指导;③加强和图书资料建设;④加强学风建设和教学管理;⑤建立科学的教与学的评价方法;⑥积极引导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观。这些意见都有利于我们改进工作。

(四)通过调查促使清华大学着力开展如下工作

一是持续进行理念提升、形成共识的工作。继2001年第21次全校教育工作大讨论,确定“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之后,在2009—2010年的第23次教育工作大讨论,以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为专题,组织全校性讨论会,以进一步提高共识并推进具体工作;近年清华大学在第24次教育工作大讨论基础上,发布了《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面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世界变革的未来趋势,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坚持和完善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教育教学体系,努力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人格、创新思维、宽厚基础、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为此,明确提出“建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体系。”

二是下大力气抓好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认真将全校本科生13个学分的文化素质课开好。对所开设的课程要经过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委员会认定和评估,并决定课程的增减,由教务处组织实施严格的教学管理和质量评估。着重抓好共同核心课程的建设,切实将课程建设向规范化、精致化方向推进。加强政策引导,充分调动校内教师资源,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热心文化素质教育的师资队伍;尽量用好社会上和兄弟院校的优秀资源,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吸引名师来清华大学授课,有两门国家精品课程的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退休后,被请到清华大学教学,他讲的三门课得到学生很高评价。

三是进一步增加文化素质讲座的数量和规模,提高质量、扩大受益面。

四是在专业教学中,着力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学校要求教师在专业教学中要讲出哲学、历史、社会,讲出思想、精神,体现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使学生既学到专业知识又有更深刻的文化感悟,从抓试点做起,逐步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五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清华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明确了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素质教育为战略主题,统筹融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通过设立新雅书院(通识教育实验区)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新雅书院推行住宿学院制度,按学科交叉和大类融合原则住宿,通过共同通识核心课程学习和以学术为导向的书院活动,形成跨学科、跨专业学习和交流的学术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探索通识课程与养成教育协同的综合改革。书院实行导师制,设学生顾问团和学生工作助理以及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宗旨的新雅学社等兴趣活动小组,努力体现学生是书院建设和书院活动的主体,探索新型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班级关系和院系关系。

六是努力推进大学文化的研究与建设实践。“大学文化,特别是大学精神文化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进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一起,于2002年9月组建了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清华大学以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成员为主体,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兼任“中心”主任;多年来主持参与了教育部课题“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研究”“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其个案成果包括“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清华精神巡礼”和“世纪清华 人文日新 清华文化百年”,均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出版物,作为师生学习、弘扬、发展清华大学精神文化的重要读本。

三、提升理论思维意识与能力,下大力气确立理性的教育理念

当今,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是国家人才强国的战略需求,是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根本任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针对19世纪前半叶德国民族“热衷于实际”而摈弃了哲学理论,发出警示:“一个民族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为理论思维可以帮助人们防止沉溺于形而上学。恩格斯还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认识这一点对理论思维应用于经验领域是非常重要的^[4]。那么,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理论思维并以其来推动教育改革实践以适应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需求?

首先是以辩证的哲理提升理性精神的问题。纵观世界近现代文明史,18世纪发端于欧洲的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推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弘

扬以追求真理、崇尚科学、讲求实际、重视效率、注重诚信、遵守法纪、自主进取为特征的理性精神是重大课题。当今,整个社会存在着以经验代替以至对抗理性、以人情代替以至对抗法治和契约,这些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对现代化起文化阻滞作用,为此必须大力弘扬理性精神,这是被称为“国家理性的神殿”的大学的使命,也是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需求。古典社会学理论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指出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工具理性关注过程的高效率,追求效果的最大化,而漠视人文关怀和精神价值。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这种工具理性常常发挥着主导作用。实际上呈现了“工具理性而价值非理性”或“形式理性而实质非理性”的局面。这一方面为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空前的财富,另一方面由于人文关怀和精神价值的缺失,不断引发巨大的危机,包括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面前,有人提出哈佛大学等名校应该反省。因为对这次危机负有责任的华尔街的高管们大多出身于哈佛大学等名校,他们在校期间接受的专业教育只专注于教学生如何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这一点在哈佛大学原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的专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佐证。刘易斯批评“哈佛的领导人听任学校的办学方向偏离教育的宗旨,只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大学应当肩负探索未知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并适应国际化和社会需求的任务,但是正如刘易斯所强调的:“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哈佛领导在种种诱惑面前,忽视这个核心问题,是在追求“失去灵魂的卓越^[5]。而“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更是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

正是资本主义逐利原则加剧了科学与人文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社会根源。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也给出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努力提升理性精神,同时,必须端正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偏向,防止“失去灵魂的卓越”。这一点无论是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还是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继承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以无通才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之说,建国后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以及新时期“教书育人”“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偏重工具理性的哲学观阻碍了这样的教育理念有

效地确立。

在我国高校,偏重工具理性倾向的重要表征是重视物化和技术化的目标,轻视精神因素。在教育教学中人文教育被职业教育所屏蔽,偏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忽视科学技术的精神价值,忽视知识转递和能力培育过程中心灵的教化、人格的培养和科学思维的养成。在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基础上,这种偏颇又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不利于具有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全面培养,使得我们的学生既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失根现象,又缺乏科学的理性精神,影响了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创造性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也不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建设。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学术活动是大学存在的基础,在学术创新的过程中,价值理性解决的是动机和动力机制的问题,对创新起导向作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同时,创新还有赖于工具理性的作用。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基础并为其提供智力支持。价值理性引导主体解决“做什么”,而“如何做”,则要靠工具理性解决,人们在实践中必须依靠工具理性来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教学不仅常常忽视价值理性的培养,而且在工具理性的培养中呈现忽视受教育者能动性的“工具化”倾向,那种作为理性精神重要体现的为追求真理和人类福祉所需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能得到有力的支撑和传扬。

长期以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以知识的存储量和提取知识的准确性作为检验学习标准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教育思想与方法上,以教师为中心的传承式、灌输式教学过程,约束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制约了学生的创造性。实际上,21世纪在教育思想上最终需要实现的核心转变是在对学生精神生命主动性发展的认识上,应当“把个体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这就要求教师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以至教育角色,把自己的职业本质定位为创造人的精神生命^[6]。这种教育理念对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重要性已经在一批世界顶尖大学的实践中得到证明。譬如哈佛大学,曾于1869—1909年掌校40年的艾略特,强调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的选择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中解放出来。认为学生只有变成学习的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当今

面临培养大批创新人才的巨大压力,教师们有效革除“工具化”教育的模式,激发学生的精神生命发展主动权的任务显得更加紧迫和珍贵。多年来,清华大学一些教师积极引导阅读经典和课外读物,开展课堂或网络讨论,吸引学生参加到教师的研究活动中来,包括由顾秉林校长率先开通、许多学术带头人积极参与的新生研讨课,就是很有意义的教育改革实践。在这类课上,教师不再从头讲到尾,而是布置、把握讨论题目的主持者。有教授说,这里教师和学生间不再是“喂鱼者”和“鱼”的关系,而是在知识海洋中共同游泳的“鱼”,教师发挥着在前面导游的作用。2007年学校又开设出跨学科的实验室研究探究课,由于活跃自主的研习氛围和跨学科的特点,受到普遍欢迎。但是,总体看,这些都只是局部的试验,要完成从传承式到研究式教育的根本转变,还需要广大教师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上达成新的突破。我们应当在深入研讨教育思想,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的同时,通过对教与学评估体系的改革,充分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提升教育理念的同时,重新审视和调整培养计划,使学生从被动负担中解放出来。

当前我们正面临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重大课题,其内涵不仅仅指理论的创新、科学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等客体的创新,还应当包括人的主体的创新,人的精神生命的创新,后者带有更为根本的意义,是文化创新的核心和基础。所以,我们应当把文化育人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来认识和实践。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是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但是,要真正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必须将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落实到包括专业课程和环节的教育教学全过程,不然就会事倍功半。同时,在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时,应当重视实践环节的作用。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既要重视理念上的教育,哲学思维的引导,又要重视实践案例的说服作用,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另一层是经过自身实践的教育与内化作用。

(胡显章,清华大学原校党委副书记,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第二、三届顾问,北京 100084)

参考文献

- [1] 杨振宁.大学教育与文化自觉[M]//甘 阳,等.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三联书店,2006,序一.
- [2] 袁贵仁.加强大学文化研究 推进大学文化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2(10).

-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5-467.
- [4] 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 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219,47.
- [5] 郝克明.面向 21 世纪 我的教育观(综合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331-340.
- [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Research and Think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Hu Xianzha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challenges and task for higher education push the work of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forwar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Tsinghua University is used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expound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the rationale behind such educational endeavor.

Key words: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research; rational thinking

(上接第 8 页)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各个环节,首先是要融入教师的心灵。毛泽东早就说过,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可以说,素质教育问题也主要是教师问题,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就要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师。

总而言之,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它的思想渊源是中华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和现代教育理论,它的实践就是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进程。对素质教育的知与行,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中不断深化和丰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在素质教育的轨道上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实施素质教育,不仅要作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也要成为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主题,不论我们处于哪一个具体岗位,都应该具有实施素质教育的文化自觉。

(龚 克,南开大学校长、教授,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天津 300071)

O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Gong K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Implementing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has been an ever deepening and enriching process in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the very strategic core 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s well as the keynote of education practice. Knowledge-wise, it is essential to realize to cultivate graduates with good virtue is the mission of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so that liberal education is critical but not the limi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included and expanded but never rejected.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s by no means supplementary but the core of the education strategy, for it is with fundamental, overall and long-standing significance. Practicewise, it is imperative to make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a strategy through policymaking, to reform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format through education practice, to balance virtue,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s education in a new structure, to build a regulatory and, in particular, an evaluation system that is concerted with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n the aspect of mechanism, to make it critical to nurture competent teachers with good virtue in practical work.

Key words: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strategic topic; cultivate graduates with good virtue; knowledge and practice